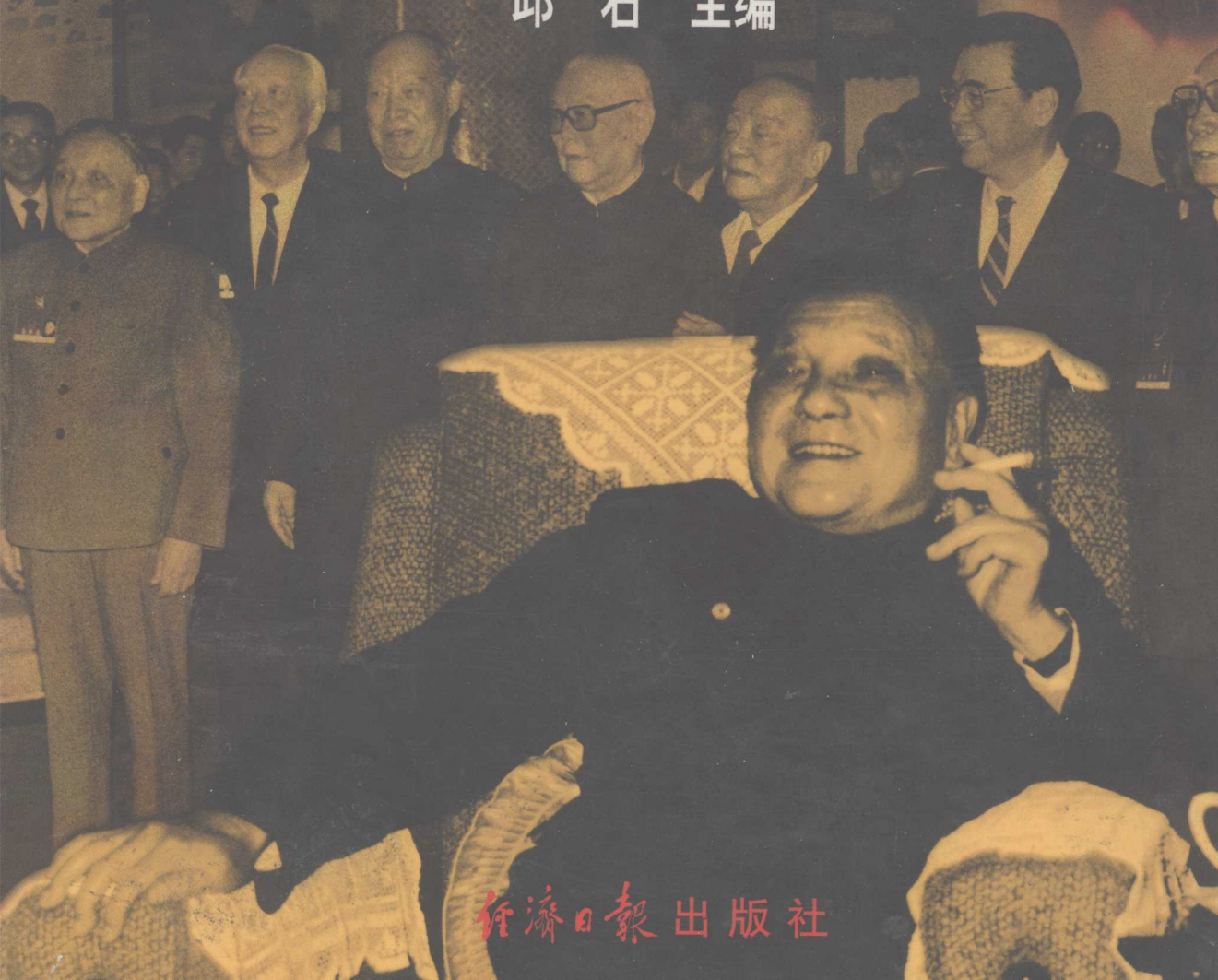


共和国轶事

共和国重大事件和 决策内幕

邱石 主编



經濟日報出版社

共和国轶事

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

(中卷)

邱石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共和国轶事：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邱石主编.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8

ISBN 7-80127-488-1

I. 共… II. 邱… III.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 IV. K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0296 号

共和国轶事

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

邱石编

主 编：	邱 石
责任编辑：	钟 仁
责任校对：	何 力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100054)
总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云浩印刷厂
规 格：	787×1098 毫米 1/16 135 印张
字 数：	3030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ISBN 7-80127-488-1/D·45

全三卷定价：698.00 元

祸殃众生的无为“共产”梦

在整社期间，还派来了一位华东地区一级宣传员×××，他在一次万人群众大会上提出：谁要退社，政府将和他把帐算清楚：有大军渡军时的损失账，刚解放时的救灾账，几年来的救济贷款账，成立农业社时的贫农合作基金账，全国各地派来救灾医生，从云南、四川等地调来大米和种子的各项费用账……把老实的农民说得目瞪口呆，一个个只得背地叽咕：

“原来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现在又变卦了。”……

响山公社干部，因怕姚奎甲来，从干岭到公社，一路上村村都竖了旗子，姚的黑车子一到，各处旗子就放倒，干部们一见这个标记，公社只留个别人接待他，大多数干部都躲开了。

“风”从天上来

无为，是安徽的一个大县，面积有 2900 多平方公里。解放初期，人口为 943397 人，1369302 亩耕地。它位于长江北岸，与全国四大米市之一的芜湖隔江相望。过去沿江是一望无边的荒湖，湖内杂草丛生，曹操率领 83 万人马下江南时，到此望而却步，叹曰：“此乃无为也”。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七师常驻这里与日寇周旋。1949 年 4 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刘、邓大军从这里千帆竞发。

1954 年，百年未遇的洪水冲破长江大堤，淹没百万亩农田，在党的关怀下，放贷款、送口粮、捐寒衣，组织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在如此的大灾年景下，竟无一人因缺衣少吃而丧生，因而在广大人民心目中，毛主席、共产党再一次体现了伟大救星的光辉形象。

1955 年春，全县成立了 1119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久，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论述，县委对合作化运动由“小脚女人”的步伐，一下变为风驰电掣的快车，全县一气呵成“社会主义合作化”。这时，全县最大的高级社白茆洲高级农业合作社，在原来的 106 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小社基础上自愿联合起来，不顾客观情况，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完全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加之当年的收成很

不理想，以致农民家庭收入寥寥无几。不少人在秋后即缺米少柴，随之纷纷要求退社，有的成群结队抢分集体的存粮；有的硬行私分集体保留的稻种；有的公开责怪政府，咒骂干部。一时人心惶惶。

省、地派来了工作组，“对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干部、党团员中的右倾保守、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平均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在整社期间，还派来了一位华东地区一级宣传员×××，他在一次万人群众大会上提出：谁要退社，政府将和他把帐算清楚：有大军渡军时的损失账，刚解放时的救灾账，几年来的救济贷款账，成立农业社时的贫农合作基金账，全国各地派来救灾医生，从云南、四川等地调来大米和种子的各项费用账……把老实的农民说得目瞪口呆，一个个只得背地叽咕：“原来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现在又变卦了。”从此再也无人要退社了。这就是无为县农业合作化的一段历史，也是后来大跃进、共产风的先奏。

大跃进那年，安徽省委从安庆地区调来一个叫姚奎甲的担任无为县委书记。当时整天处在饥饿线上的农民们，纷纷逃到江西省。那边的干部和农民对逃去的“灾”民，寄予同情，给他们田做，给他们饭吃，有的还发给接收证明，让其全家迁去。姚奎甲视此情况，一面向省委反映，要求省委干涉，批评江西省随意接收安置，一面派人前去动员返回。还要求各个车站、轮船码头，凡无正式证明的，一律不卖票。处于断炊的农民，逃命遭到百般阻拦，已经逃出者又被追回。被追回后，又得不到生活上的安排，遭厄运者数量很大。

人民公社的假、大、空

1958年9月间，公社化运动势如破竹，此时大跃进高潮已推向顶点。全县原有435个农业社，一瞬间并为31个人民公社。

如何办得一大二公，办成共产主义性质，当时县委拟了一个“关于试办共产主义人民公社问题”草案，谁知不到10天的时间，即普遍实现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了。

严桥区响山农业社的社长叫陈广复，是个老退伍军人，此人在部队搞过供给工作，他在1955年就在农业社实行过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公社化时搞起供应制更是轰动一时，连毛泽东主席都知道了他的名字，说“安徽省无为县在三国时曾出现一个黄文炳，现在又出了一个陈广复”。当年毛泽东视察安徽时，还要到他们社去看看，因交通不便，未能成行。陈广复的响山社供给制有这么一段顺口溜：

发米发柴又发盐，
过年过节样样全。
有酒有肉有香油，
红糖鞭炮带挂面。
到热天，发草帽，
另有一把芭蕉扇，
有毛巾，有香烟，
还有肥皂洗汗衫。
要结婚，就支款，
生了孩子更安然，
有产假，还不算，
糯米红糖加鸡蛋。

继后《人民日报》发出了《安徽省响山社最早实行供给制》的报道和《一棵共产主义的幼芽》的通讯。文中肯定地说：“响山社许多可贵的创造，是发人深省的。全国农村正在大跃进，时代逼着我们必须考虑共产主义的具体形态。共产主义，应像列宁指出的那样：‘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划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根据需要自由地领取’”。

无为县共产风的表现，除实行“供给制”外，就是刮平调风。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平调的种类有土地、劳力、耕牛、农具、房屋、家具、家禽、家畜、现金、粮食、柴粮、柴草、木料、砖瓦、芦席、毛竹、稻箩、车辆、鱼、藕、棉被、棺材等。

据袁乃平、吴克明、朱宗新3人于1960年12月12日调查的红旗公社新民大队情况：“全大队共平调的房屋471间，拆掉房子109间。平调土地119.9亩，平调耕牛21头，平调水车119辆，母猪21头，手推独轮车35辆，船1条。

据县统计资料标明：1958年期间，县向公社调支的劳力所做的劳动日就有736万个，连同各种器材物资总共价值746万多元。大江公社1959年提出要实现“七个万”，即万头猪场、万鸡山、万瓜棚、万鸭棚、万鱼塘、万鹅滩、万亩丰产片。这股风推动下面的“共产风”，公社提几个“万”，大队提几个“千”，生产队也提几个“百”，层层要从下向上调，千方百计集中凑数，如此把下面搞得空如水洗。

三年的共产风（笔者认为办人民公社的实质就是共产风），给无为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据有关资料表明：

一、大量的饿死人。据县公安局统计，全县1959年非正常死亡几万人，1960年又死亡十几万人……

二、耕牛农具大大减少。1957年全县耕牛共有38597头，到1960年只有28100头，减少10497头；大型农具原有294805件，到1960年只有118561件，减少176244件，其中减少程度最严重的是无城区，达80%。

三、土地荒芜，粮食减产。从1958到1960年，粮食产量年年下降。粮食总产量1957年为6.7亿斤，1958年为6.2亿斤，1959年为4.4亿斤，1960年为4亿斤，与1957年比，减少36.5%。

还有“从1958年秋到1960年春，大集中、大平调、大搬、大拆和大兵团作战之风，一刮再刮。1959年秋后，全县实行家禽、家畜大集中，普遍出现大杀、大吃、大卖等现象，搞到最后，几乎绝迹。

整个农村被搞得满目荒凉。

从衣食父母嘴里夺粮

姚奎甲是中共无为县县委书记，他为了保官，编造了瞎话。千千万万农民在死亡线上呼救了，有的已在一边张口要吃，一面咽了气，姚书记反而说那些“不缺货”、“闹粮”，甚至还下命令要基层干部反“瞒产私分”，使很多无辜者遭到打、骂、捆、吊等皮肉之苦。

无为县福民乡古楼农业社在反“瞒产私分”中，据不完全统计，捆、绑、吊、打社员36人，其中打伤3人……

1958年底粮荒日渐严重，大多数农民都在嗷嗷待哺。一次姚奎甲却在县委扩大会上说：“现在农村到底有没有粮食？我们回答是，粮食不仅有，而且很多。粮食问题，关键是领导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

1959年2月11日，姚奎甲在区、社书记会上还强调说，“要认真清理仓库、种子、加工厂和食堂，查草堆打未打，场基上有没有稻，查代食品找未找尽……”

14日，姚奎甲亲自主持的大江公社反瞒产会议，追逼十分激烈。一个大队书记赵完成被撤职，官镇大队骆以寿被斗被打；东河大队牌坊生产队一姓魏的小队长，姚还叫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朱治华组织人专门斗争了两天。姚对精华大队会计赵同庆说：“你不交代瞒产账，就法办你，审你罪，看你狠还是我狠。”东河大队生产队长汪为山，被斗时，受到打、拖、冻，还把衣服扒掉用冷水浇。赵渡大队副书记刘长山说他瞒产3000斤稻子，姚一见面就说：“你还蒙我吗？你不讲，我比你懂得更清楚。”这次谈话到深夜，刘长山跑回家就自缢而死。刘死后，姚奎甲还布置大队写报告说刘长山贪污公款，瞒产私分（均非属实）与反革命的女人结婚，宣布刘长山叛党畏罪自杀。

12月中旬，姚带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等人，在六洲公社新华大队搞反瞒产重点时，亲自和通信员张修白吊打了生产队长李必松，并指使民兵和通信员捆绑生产队长胡必喜、陈能富和会计李必华3人，以后又捆吊打12人。

姚奎甲一面逼迫下面反瞒产，把农民中的口粮搜尽，一面逼迫干部，千方百计

抓粮入库。1960年秋粮入库时，虚报的受到了表扬，还登报说“一马当先”。开城公社实际入库只有3万斤，粮站站长如实上报，姚叫办公室副主任打电话说：“把这个狗娘养的绑上来。”一次姚打电话要土桥公社书记马玉根继续送粮，马说：“只剩30万斤种子，实在无法送了。”姚说：“口粮也要送。”

1959年10月，尚礼公社已饿死人。姚在公社书记会上对该社书记刘谊宽说：“你回去，如3天完不成24万斤征购任务，下次来开会就提头相见。”第二天晚上姚召开电话会，刘因吐血病倒，由副书记任士好接电话，姚命令刘马上到县里来，刘还不敢说自己吐血，连晚跑到县里，结果被逼得将30万斤种子送掉。

姚奎甲对下抢夺农民的口粮，对上汇报还说对农民的口粮已作了“很好的安排”。

无为大量的饿死人的问题暴露后，姚奎甲即调往徽州地区，去后不久，省委即通知他到无为作检查，他在1961年1月14日无为县委召开的常委会议上检查说：由于浮夸，1958年得中央的超纲要奖状，1959年得地委的超纲要红旗。在征购上任务一加再加，既卖了口粮，又卖了种子，前面卖粮，后面无吃。特别是1959年冬部分食堂停伙断炊几十天，而我不顾实情，仍布置打闹秸稻和搞社会余粮。在粮食入库时，每天要入库数量，少报不行，多报欢迎，如刘渡公社先报一天完成20万斤，批评后，逐渐增加到每天70万斤。我们在下面设粮食临时库，也是弄虚作假……”

用专政手段镇压反映实情的人

县委来信办公室，1959、1960年共收人民来信1173件，绝大部分都未认真处理。有的还作为反动信件侦破。

一次，石涧公社党委书记谭布真，匿名向中央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姚奎甲在省里开会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告知谢永康，要他配合省公安厅蒙处长进行专案侦破。谢数次以测验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为名，要全县大队以上干部每人亲笔写一份学习心得送到县委，核对笔迹。在查对不着情况下，姚奎甲就到处怀疑，逼迫县委办公室主任谭荣植、原副县长刘希文及汪卓、朱吉祥、胡志杰等同志承认，最后谭布真怕连累别人，主动承认是他和一名大队干部写的。结果谭被斗争，定为右倾分子，受到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两级处分，并送农场劳动。

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钱汉轩，病退后化名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反映无为农村情况。姚收到这封信后，即交县委办公室转赫店公社书记丁学甫进行侦破（因看出是从赫店邮局发的），并叫公安局拍成照片在赫店公社到处查对。钱怕定错他人，即向丁学甫承认是他写的。当时钱正发烧，天在下雨，姚得知消息后命令丁学甫立

即派人将钱送到县里。姚一见钱就破口大骂，“你这个混蛋，是张恺帆的爪牙、走狗，吃饭不干事，还向中央告状”。随后把钱关了一个多月，组织两次斗争，令其反省。

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因所谓的右倾错误，在遭到错误的斗争之后，姚奎甲对张有过接触的人也进行了残酷的斗争，有的被罚跪，有的被扒衣服，并进行秘密搜查、严格监督、强迫劳动。并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送到大蜀山畜牧场劳动。

一次，田桥公社书记季永山、庙后大队书记杨克才、港河大队大队长汤圣传3人写信给毛主席，并上北京反映姚奎甲及无为问题。姚得知后，即派人去北京将季等人领回，经过斗争后下放劳动。后将杨克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教；季永山、汤圣传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3级降为25级的处分。在他们劳动期间，杨克才因去芜湖一趟探望爱人，季永山请假去马鞍山看病，姚说他们不老实，还想告状，即将他们逮捕起来，关押一年零8个月。

严桥南岳小学副校长陈英，于1959年7月至10月3次向姚奎甲写信，反映当时无为基层干部作风和群众生活的实际问题。姚不但不支持，反把陈英写信问题转告文教系统整风领导小组，要其对陈斗争，并说：“有个小学教师给我写信，内容非常反动，骂到县委头上来了。我已叫县委办公室通知区里派专人将陈英送到县里来，你们要转告文教局组织专门会议进行斗争。斗争后要专人看管。我就不相信一个小学教师还整不倒。”文教局在斗争陈英期间，姚曾找陈英到县委小楼谈过话，并两次亲临会场作指示。斗争结果，将陈英划为右派分子、撤职降级、监督劳动。

姚奎甲对谭荣植说：“今后如有人向中央和国务院投寄的信，要邮局堵住，每天晚上要检查”。

一次，姚到襄安镇，见有个摆摊子代写书信的，姚怕他代写人民来信，亲自把他带到公社审讯，并把他的摊子毁掉，还威胁他说：“今后再要写，我把你捉起来法办。”后来这个人被吓得逃走了。

根据现有材料统计，被他骂的就有75人。其中有县委书记、常委、公社书记，以至小队干部。

有一次，县委第二书记吕奋志到合毛公社，发现郑河大队断粮，要求县委解决两万斤粮食，姚马上发火说：“你不能干就回来，后面跟的尽是鬼”。

一次姚奎甲因怀疑传说的“小轿车是姚政委一个人坐的，别的书记没有哪一个敢坐”的话是张云副县长说的，就把张喊到小楼上骂到：“你可知道自由主义有多少条，你这样混蛋，给我反省。”

一次，三官殿鱼苗场场长赖风旭（县委委员）汇报场里死猪情况，姚即骂他：“猪死掉了，你怎么不死。”

县农业局长胡志被斗争后，因病要求住院，姚说：“你是思想病”，并骂：“张恺帆是你亲爸、陆学斌是你干爸，现在他们垮台了，娘卖×的，你去告状吧！”。

黄洛七扩大队副书记郭胜凯（原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一次被姚找来问道：“你那里产量怎样？”郭如实汇报：“早稻单产只有六七十斤”。姚骂道：“你混蛋，你死在那里搞什么名堂，你是瞒产私分头子，你是地主思想，我开除你的党籍，开除你回家还要同你算帐”。

一次姚奎甲通知牛埠区委书记包世安到蜀山区参加会议。姚在这个会议上骂道：“牛埠区包世安刮低产风，是白旗、是右倾，不和县委穿一条裤子，你这个老东西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立即斥令包退出会场，并将包放在一间小房子里关了3个小时后，宣布撤职，要其反省。

姚对一些干部处分后，名义上是下放劳动，实际上是劳改。如姚亲自在王福大队办了一个容纳90多人的小劳改农场，其中，除派出所送去的五类分子21人外，其余大部分是干部和社员群众。在这里劳改的干部和社员，是作为罪犯看待的，强迫干重活，有的做不动就打，有时甚至不给饭吃。

姚奎甲在人面前总是摆出一副凶神恶鬼的面孔。干部、群众怕他如怕虎。

一次姚奎甲在得胜大队骂大队书记。在场的人都吓得低着头，不敢望他。待姚走后好一会时间，三益大队书记王之道才抬起头来问人家：“姚政委何时走了？我耳朵都被吓闭了气，我如再参加这样的会命也没有了”。后来该大队干部因怕与姚奎甲见面，专门开了一个边门，一看见小黑车来，干部们就从边门溜走。

响山公社干部，因怕姚奎甲来，从牛岭到公社，一路上村村都竖了旗子，姚的黑车子一到，各处旗子就放倒，干部们一见这个标记，公社只留个别人接待他，大多数干部都躲开了。

高沟公社一次正在开党委会议，听说政委来了，立刻党委散会，章大好、肖寿山、业显能等几个党委委员骑着自行车就跑。

共产党里有说真话的好首长

历史上的海瑞，在官持身廉洁，嫉恶如仇，锐意兴革，打击豪强，疏浚吴淞江，兴修水利……卒于官，贫至无以敛。

但是当代的海瑞是谁呢？他就是在那共产风暴弥漫之际，无为人民虔诚默念为“青天”的张恺帆。当时他曾被一些人诬为“大闹无为20天”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9年春以来，身为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不断得悉无为的“田园荒芜”、“灾情严重”和“民不聊生”的消息，心情极为不安，便毅然来到无为作实地察看。

他是1959年7月4日到无为的，后因得悉一些风声，于7月23日便返省城。

他在无为的整整20天里，不顾个人的疲劳，跋山涉水、披星戴月，走村串户，深入察访官情、民情、灾情。每到一处，找干部、访农民，和他们促膝谈心，并细心察看当时的干群关系、农民生活和庄稼生长的真实状况。通过耳闻目睹，证实无为情况果真十分严重。人们脸如黄蜡，骨瘦如柴，有的拄着拐棍，有的卧床不起，特别是饿死人的现象已有所闻所见。而且有的干部，面对农民受难之际，不加怜悯，反而动辄打骂。再看到处禾苗生长得犹如枯香直立。满目凄凉情景，使张恺帆心急如焚，他一面与主宰无人生死存亡的姚奎甲交流情况、沟通思想，以期求得为民解救的目的；一面多次电告省委、地委反映情况，请求给予支援，一面沿途呼喊，要求干部和群众同舟共济，启发农民多种蔬菜，振作精神。他嫉恶如仇，爱民如子。当时红旗公社王福大队书记张定根，横行霸道，打人骂人无计其数，且一次即逼死3条性命，但此人为姚奎甲所宠。张恺帆刚性秉直，通过政法部门将其逮捕。新民大队一生产队长黄大本、陡沟港河大队一生产队长倪进长因多次打骂群众并掀碎群众的锅，张恺帆对此十分愤慨，随即通过地方组织，将其宣布撤职。全县人民对他在无为察访，喊喊相告，冰冷的心灵一时由绝望变为有望。

但是，由于姚奎甲只顾个人名利，不顾人民死活，对张恺帆在无为的所言所行，耿耿于怀，恨之入骨。其时正值中央召开庐山会议，彭德怀的忧国忧民“万言书”受到了谴责。姚奎甲窥探形势对他有利，觉得张恺帆言行与彭德怀的观点相似，便搜集张恺帆的材料报省，省又转报庐山为毛泽东主席所阅。毛即在庐山会议上指出：“安徽有个张恺帆……”安徽省委于1959年9月19日做出了“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指责的罪过主要是张恺帆在无为的20天期间“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其中最主要的、最具体的就是他在无为所提倡的“三还原”、“两开放”。“三还原”即房屋还原，自留地还原，伙食还原（解散食堂）。“两开放”指市场开放、鱼塘开放（可以让农民搞搞鱼虾），就这样，把张恺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关押200多天，经批判斗争后送淮北某矿劳动。其妻史迈也受到了株连，全家被赶出省府住宅大院。

张恺帆在被错误处理之际，曾就他的冤情，作律诗一首。诗云：

神差鬼使到无城，
为报真情获罪名。
五十一天伤乱箭，
万千张口书曾参。
无心偏惹“三还”恨，
有口难吹“七字”尘。
北望都城泥首拜，
不难化骨见忠贞。

（丁人卜）

1978年前海峡两岸谋和 足迹实录

我们同台湾，谁也离不开谁，就像《长恨歌》中所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经过几次商谈，谈妥了当时6项内容：（1）蒋介石可偕旧部回大陆定居，仍任国民党总裁，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溃退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势力，与新中国为敌，直到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调整对台政策，宣传和平统一祖国的漫长岁月里，海峡两岸始终处于紧张对峙状态。然而，由于国共两党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具有某种交集点，致使这紧张对峙的寒流之中又不时涌出一股股国共秘密商谈、谋求再次合作的温泉水，从而使海峡两岸的这段关系史，成为一段既有战争硝烟又有和平呼声的历史。

毛泽东点将，张治中受命作谋和试探

50年代初期是两岸军事对抗的时期，启开国共和谈大门的是中国共产党人。1950年3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批准，开始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进行工作。1950年3月11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给张治中的电报》。电文称张“现正从事之工作（注：指张治中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进行的工作）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同年3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张治中，“同意”张“来京面叙”这方面的工作。

张治中在国民党军队中曾位至行营主任、集团军总司令、侍从室主任、政治部长和军政长官，军衔为陆军二级上将，行政上担任过湖南、新疆两省主席，与蒋介石过从甚密。同时，他又与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有着长期交往，曾为国共

两度合作而出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代表国民党同中共进行过多次和谈，有“三到延安”之举，与中共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1950年，中共中央选择张治中作为进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一重要工作的人选，无疑是非常恰当的。从现已披露的历史资料中，还无法知道张治中完成此项使命的具体情况和结果。但从上述电文可知，张与毛泽东在半个月中互通了4份电报。在张由南方赴京汇报时，毛泽东曾亲电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叶剑英，为其布置沿途护卫，可见张治中肩负的使命之重要，以及中共中央对此举之重视。

差不多与中共进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尝试的同时，台湾当局也开始了这方面的试探。这年初春，刚刚就任台湾“国际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突然召见曾任军统特工人员的高雄凯歌归饭店老板李次白。李为黄埔6期生，其妹李白文是中共高级将领陈毅的大嫂。陈毅时任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市市长。蒋经国对李次白说：“你和陈毅是至亲，可以深谈，最低限度，可以不进攻台湾”。6月1日，李次白由台湾乘海轮经香港抵上海。他到上海后，便通过妹夫陈孟熙（陈毅的大哥）引见，与陈毅见面。李次白向陈毅转达了“那边要求不进攻台湾”的意图后，陈毅并未正面答复，只是说：“至于台湾，让它烂下去！”陈的答复，可作多种理解。不久，朝鲜战争爆发。蒋经国遂于6月底通过“国际政治部”厅长、李次白的黄埔同学吴伟克发急信给李，通知停止和谈。试探国共两党之间刚刚起步的一点接触尝试遂告中止，两岸关系又经历了一段严峻的历程。

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提出

进入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开始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15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中明确表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有两种，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周恩来的讲话鼓舞着海内外的中国人。寓居美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在美国公开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一文，提出恢复国共和谈，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统一问题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通过李济深的安排，原国民党中常委、李宗仁的贴身智囊人物程思远于1956年5月从香港秘密来到北京，与中共领导人谈国共合作问题。5月12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宴请程思远。席间，周恩来就李宗仁的建议国共合作和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政策等发表谈话。他说：李德邻（李宗仁的字）的意见很好，只有一条我不同意，他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是需

要军队保卫嘛！周恩来提出：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合作，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这是中共最早提出的国共第三次合作思想。周恩来特意请程思远向李宗仁和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士转告，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中国的一句古话：和为贵；欢迎包括李宗仁在内的所有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予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在此期间，中央还发出《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并设立了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有徐冰、罗青长、童小鹏、凌云等参加，周恩来直接领导，李克农、罗瑞卿具体负责。

曹聚仁的报道

1956年7月，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蒋经国的私人秘书曹聚仁来北京访问。16日，周恩来在颐和园会见并宴请曹时，进一步阐发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曹试探地问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说：“‘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问题都可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恩来希望曹将此消息转达给台湾当局。1956年8月14日，曹聚仁在《南洋商报》上发表题为《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总理会见记》的文章，公开报道了周恩来关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重要谈话。

蒋介石派宋宜山来大陆探风

在台湾的国民党集团对中共的和谈呼吁虽持消极态度，但为了摸清中共的真实意图，也作了一些谨慎的反应。1957年，蒋介石在台北召见当时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示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决定派人赴北京刺探风声，了解中共是否以“和”呼吁为烟幕而对台湾用武，以便制定相应的对策。蒋介石还提出人选问题，即不拟台湾派出，应在海外选择。许孝炎当即提出三人供蒋介石选择：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山和“立法委员”宋宜山，蒋最终选择了宋宜山。

蒋之所以决定宋宜山，原因有四：第一，宋宜山对国民党一贯“忠贞”。宋早年毕业于南京国民党中央党校，后被派往美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供职。国民党自南京退败时，宋任国民党组织部人事处长，可谓久经考验。第二，国民党退台后，宋任“立法委员”，身份较为灵活，官式意味较轻。蒋不愿派一名官式身份过重的人前往。第三，宋的亲兄弟宋希濂为国民党战犯，当时正在中共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北上万一被人发现，亦可以说是去那儿探亲。第四，宋宜山系湖南人，而当时湖南同乡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也在北京，对话比较方便。

1957年4月，宋宜山自香港经广州乘火车赴北京，当日即会见了唐生明。唐当时是受中共中央统战部委托出面接待的。第三天，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唐生明陪同宋到北京东兴楼饭店用餐。在餐厅里，周恩来接见了宋宜山，曾与之交谈。尔后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具体商谈。商谈中，中共方面表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政务仍由蒋介石先生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外国军事力量必须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在北京期间，还参观了石景山钢铁厂、四季青农业合作社、故宫、颐和园，还去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望了胞弟宋希濂。5月，宋宜山返回香港，根据北京之行的观感，写成15000字的报告，经许孝炎转呈蒋介石。报告除汇报了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情况外，还叙述了北京之行的各种见闻，反映了中共治理下的祖国大陆呈现的勃勃生机。

但，正当国共和谈的步伐刚刚迈开时，中国大陆开展了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许多同中共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这不能不对海峡彼岸的国民党集团产生消极的影响。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与章士钊的香港行

1958年夏季，中共炮击金门的举措震惊了台湾当局和美国。美国加紧推行“划峡而治”的阴谋，与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方针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了蒋介石对美政策的两面性和维护“一个中国”立场的民族性。为此，中共中央作出令世人皆惊的异乎寻常的决策：停止炮击金门，实行“联蒋抵美”政策，让金门马祖暂留在台湾当局手中。8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国民党派来了解情况的曹聚仁，并谈了话，有意将此意图通过曹转告台湾。曹在《南洋商报》上透露了此事。10月6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台湾危机。在此之后，又在公开场合多次发出呼吁，同时通过秘密渠道与台湾当局接触。

1958年10月，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的同时，中共中央采取了另一个行动，即请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均有私谊的章士钊沟通两岸和谈的管道。在炮击金门的硝烟尚未散去时，毛泽东就有了嘱托：请章士钊写信给蒋介石，把中共“联蒋抵美”的方针事先告诉台湾。章士钊欣然应命。章是国学大师，古文极好。这封信写得很有特色。信中说：“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台湾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泽东对这几句特别欣赏，但他认为把对台湾看作“南天”不恰当，后来改为“南云”。随后，章士钊又从北京来到了香港。章的香港行，立即引起海外传媒的各种猜测。港台许多报纸发表消息，称章士钊是中共的“和谈专使”，拟通过私人关系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和谈条件，言其所带条件有最低和最高两种，前者是暂时什么都不谈，双方先作有限度接触，诸如相互访问（官方或私人团体均可），通邮、通电，然后再通机、通航；后者则同意给台湾以类似当年陕甘宁特区的地位，可拥有自己的政府、军队、党组织，经费亦可由大陆负担，只要求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台湾当局对此和谈条件没有做出积极的响应。

毛泽东评点蒋介石和台湾问题

1959年2月初，毛泽东在一次对省市书记的讲话中谈到国共两党进行秘密、间接接触的情况。他说：“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10年、20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结果，那是毁了自己。”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中共方面捎话表示赞成。周恩来通过张治中给蒋介石、陈诚写信，信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四句话：“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希望他们团结起来。2月27日，毛泽东在会见摩洛哥共产党代表团时又说：“现在我们又讲跟蒋介石合作，他说不干，我们说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干，我们说有一天美国要整他，总有一天美国要承认我们，丢掉他。蒋介石懂得这一点。我们搞第三次合作，他通过秘密的间接的方法跟我们联系，公开不敢，怕美国，而我们不怕”。毛泽东还说，我们同台湾，谁也离不开谁，就像《长恨歌》中所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蒋介石把枝连着美国，而美国却连根都要挖掉。

中共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对台湾方面产生了影响，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有了相当的发展。台湾当局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曾表示，他们不再派人到大陆“进行扰乱公共安宁和破坏地方秩序的事”，并说，“进一步派人到大陆去谈谈是不可避免的，也是

必须的”。

1965年3月，陈诚病逝，台湾报纸发表了陈诚的遗嘱，这种遗嘱一般都要涉及到“反共反攻”的内容。而陈诚作为国民党的“副总裁”、“副总统”，其遗嘱既没有讲到“反共”，又没有讲到“反攻”。中共通过有关渠道反馈回来的信息谈到，陈诚要周恩来相信他的人格，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也就是说，不会让台湾分裂出去，做民族的罪人。陈诚的遗嘱发表后，周恩来在政协民主人士会议上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从陈诚的遗嘱看，这是我们对台通气工作、传话、传信的结果，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效果，有影响。

“文化大革命”打断了两岸秘密和谈进程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毅然回国。这一举动给台湾国民党当局极大的震动。为了探听大陆中共方面对台政策的去向，1965年，蒋经国亲自到香港接曹聚仁秘密抵达台湾。曹早在1956年7月至10月，在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会谈后，曾多次与台北方面秘密联系，致力于商谈和平统一大业。瞬间已过去近10年。这次曹抵台的第3天，蒋介石在蒋经国陪同下接见了曹并开始磋商。经过几次商谈，谈妥了当时6项内容。这6项内容是：（1）蒋介石可借旧部回大陆定居，仍任国民党总裁，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2）蒋经国出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3）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有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补助；（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为4个师，其中1个师驻金、马地区，其余3个师驻在台湾；（5）厦门与金门合并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湾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6）台湾现任文武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在日月潭谈妥的上述条件等北京方面认可后，台湾方面将派人赴大陆作最后商定。然而，此时，大陆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共对台工作实质上陷于停顿。这样，祖国统一的谈判遂告中断。从此，海峡两岸关系进入政治冷战、外交抗衡的时期。尽管如此，在“文革”动乱中，周恩来仍始终把对台工作放在心上。当他得知浙江奉化溪口蒋介石母亲和他的毛夫人（蒋经国生母、抗战时被日本飞机炸死）的墓被破坏的消息，立即让童小鹏打电话给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要他对红卫兵做说服工作，说明中国人历来将“挖祖坟”看成是最不得人心的事，我们不能那样做。周恩来还要浙江省委派人员将蒋家的墓地修好，并将修好的照片交章士钊带到香港转给蒋介石。